



團結一致拚經濟是港人最大共識

新聞背後

卓銘

有民調機構日前發表最新民調，指香港市民最關注經濟問題、民生次之，最後才是政治問題。港人對政治問題的關注下降，反映的正是香港政治環境趨向穩定，香港再也不是過去那個「泛政治化」的香港，議會也不再被政治爭拗拖後腿，社會得以集中精力，關心真正值得關心的經濟和發展問題。這不但代表了香港社會幾十年來思維的改變，更象徵香港正擺脫過去「泛政治化」的色彩，能團結一致謀發展拚經濟，開創更好的未來。

相關民調顯示，選擇最關注政治問題的受訪者只有13%，關注程度回落至2018年或之前的水平。至於最關注經濟問題的則有46%；民生問題為39%。

從數據上可以簡單看見，香港已不再是過去那個「泛政治化」的城市，今時今日，如何進一步拚經濟、改善民生，才是市民關注的重點。事實上，即使同過去30年的數據比較，其實絕大多數時候，香港市民都較少優先關心政治問題，直到2019年，相關佔比率才急遽上升。

關心政治問題本身固然沒有問題，然而2019年那種「關心」的方式，卻表現在打砸搶燒、衝擊立法會、綁架區議會，甚至企圖癱瘓政府、顛覆政權等違法行為上。其結果是非但香港的政治問題沒有解決，連帶對經濟和民生造成嚴重損害。這樣的「關心」，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而經過黑暴洗禮後，香港也基本形成要求社會恢復穩定的最大共識，團結一致謀發展，共同創造由治及興的繁榮未來，才是現在香港的最大方向。

告別過去「泛政治化」環境

因此，市民對政治問題的關注度下降，是重回正軌的體現。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人喜歡上綱上線，拿着公眾轉而關注經濟和民生問題這一點，就聲稱香港經濟民生「差到不行」，甚至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云云。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述不但反智，更與事實不符，只要稍微有點邏輯思辨能力，都不至於會被迷惑。

首先一個大前提是，一個正常社會，

不論什麼制度、有什麼意識形態、有什麼核心價值，都必然會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歷史上從來不存在任何完美到沒有任何問題的國家或城市。從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到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加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獲得通過，「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徹底落實，香港政治環境已臻於完善。至少與過去數十年比較，現在的香港政治爭拗大幅減少，市民基本上已形成謀發展拚經濟的共識。在這種情況下，市民對政治問題的關注降低，轉而更加重視經濟和民生問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然而，這只是反映了市民的側重點改變，絕不代表香港的經濟和民生情況惡化。

如果覺得光憑理論難有說服力，那不妨再看看各種實數數據。兩個月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現時香港的資產管理規模超過30.5萬億港元，有市場報告推算香港有超過2700個家族辦公室，而本港資產管理的規模和港股市值，均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10至11倍。除此之外，還有約50間重點創科企業表明會落戶香港和拓展香港市場，料未來數年

可帶來超過400億港元投資，以及逾1.3萬個職位。

外資對香港投下信心一票

除此以外，要求申請人至少將300萬港元投資放入支持創科和其他重點行業「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投資組合」的新投資移民計劃，亦收到346宗申請；截至5月底，有89間家族辦公室落戶香港或擴展業務，其中72間來自內地，其餘來自東盟國家、中東及歐美等地，另有超過130個家族辦表示正準備或已決定在港設立或擴展業務。如此大量的資金和人才湧入，反映的都是對香港市場前景和營商環境的信心一票。如果香港經濟真的不行，這些資金從何而來？難不成全世界所有生意人都是傻瓜嗎？

就算是民生問題，現屆政府也展現出「以人民為中心」的擔當態度。這裏先舉一個數據，新一屆區議會運作至今超過半年，收到有關區議員的投訴宗數是零，區議員的績效指標亦全部進度理想。其實在新冠疫情中，我們已能看見不同的愛國愛港團體眾志一心為居民派

發物資、在抗疫路上攜手互助。如今特區政府不只加強與愛國愛港團體的聯繫，地區民政事務專員也聯同新一屆區議會、關愛隊，每日為地區居民的福祉奔波。小至家庭訪問、街道衛生，到火警、停電、暴雨等突發情況，到處可見不同地區人士和政府部門緊密合作，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

而且政府近年針對房屋、青年流動性等老大難問題，亦不斷出台各種新政策，例如簡約公屋、為劏房居住環境設定最低標準、制定《青年發展藍圖》，獲得社會各界的肯定。誠然香港的民生問題仍有不少尚待解決，但情況已大有改觀。如果看看國外，比如像英國那樣經濟陷入衰退、國內種族矛盾日漸升溫、通脹居高不下……與之比較，香港不論是現況還是前景，都更有底氣和自信。

社會更聚焦經濟和民生問題，反映的是港人對於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生活的渴望，現在香港已經沒有「泛政治化」拖後腿，團結一致為香港未來貢獻力量，正是全體港人的共識，也是香港由治及興新篇章的起點。

從奧運佳績看完善運動員退役保障



體壇心聲

劉國堅

奧運獎牌，可惜效果未如理想。巴黎奧運後，相信劍擊運動很有可能被設為「精英中的精英」項目，投放更多資源重點發展，目標為爭取奧運獎牌。

這些資源主要投放在幾個方面，第一，運動員的直接資助，如獎金和薪金，今屆巴黎奧運的獎金已經是破天荒最高的一屆，達到六百萬的獎金。第二，運動員的海外集訓和比賽，運動員必須長年累月到國外（如歐洲）參與高水平的集訓和比賽，以確保獲得最好的訓練環境和條件。第三，聘請更多高水平的教練，近年香港劍擊隊已從各個劍擊強國聘請高水平的的劍擊教練任教不同的劍種，例如江旻德和張家朗的教練也是從羅馬尼亞和法國聘請的世界頂尖級教練。

二是劍擊運動會更加普及

這裏不是指更加多成年人會參加劍擊運動，而是更多家長願意讓孩子嘗試參與或投放資源培養孩子發展劍擊運動。家長們看見江旻德和張家朗的成功例子，會憧憬他們的孩子也有一天能像他們在奧運會奪取好成績，因此小孩子參與劍擊運動的人數必定會增加。

以我開辦的劍擊學校為例，過往每天平均收到4至5個查詢，但江旻德奪金後，一天便收到20個查詢，更有家長安排子女即時試堂。

過去20多年來，私人劍擊學校一直推動香港劍擊運動普及化，江旻德和張家朗小時候都是在私人劍擊學校開始接觸劍擊運動，若果更多家長願意讓孩子參與劍擊運動，會令將來投身當劍擊運動員的人數提高，直接影響優秀運動員出現的機率。

三是更多人願意投身全職運動員

近年香港的劍擊運動成績和水平有所提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願意投身全職運動員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當張家朗在上屆東京奧運奪得香港歷來首面劍擊金牌後，很多年輕運動員都以他為榜樣，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因此相信在巴黎奧運後，江旻德和張家朗取得佳績會激勵更多年輕運動員，勇於投身全職運動員行列，追尋他們的夢想。

不過在運動員追夢背後，其實也面對很多困難和掙扎。為了進一步促進香港體育運動的發展，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設立運動員退休保障計劃，制定完善的退休保障政策，為運動員退役後的生活提供穩定的經濟保障。在很多體育強國也有為運動員設立退役金，按照其代表國家的年資和成績，在退役後發放應有的退役金。例如在內地一些省市級體校，多年前已制定運動員退役金的政策，這方面值得香港參考借鑒。

二是完善運動員升學計劃，為運動員提供更多元化的升學機會，不僅讓他們在運動事業中追求卓越，也能兼顧學業發展，為未來的職業生涯鋪平道路。這方面香港已經比以前進步，香港體育學院和各間資助大學已設立了「香港學生運動員計劃」，除了可按照運動員的體育成績直接取錄外，還提供其他相關幫助。建議各大學可以繼續完善有關計劃，為運動員提供彈性學習方案，例如把畢業年期延長，根據運動員比賽季節，選擇讀取不同學分，甚至為運動員提供度身定做的上課時間表，務求盡力幫助他們在運動上追求卓越之餘，同時發展他們的學業專長。

提供更多就業就學選擇

三是建立運動員就業計劃，為退役運動員提供更多樣化的就業選擇，讓他們能夠順利過渡到事業發展的新階段，發揮自身的專長和技能，為社會做出貢獻。例如意大利和日本政府就為退役運動員安排工作崗位，例如當警察或軍人，在退役前他們更可一邊繼續訓練和比賽，一邊接受着公務員的薪金和福利，直到退役便直接轉職成為公務員，令他們退役後無後顧之憂。

以上這些建議，可減少運動員對退役後的憂慮，鼓勵他們全身心投入訓練，為香港體育事業貢獻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通過上述措施，我們相信包括劍擊在內的香港體育運動發展必將迎來新的騰飛，江旻德和張家朗奪得奧運金牌必將成為香港體育發展的新起點，推動中國香港成為國際體育強隊的重要動力。

兩屆奧運香港劍擊代表

發揮香港所長 融入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潮



議論風生

陳瑞娟

中國共產黨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實責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從制度層面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決定》提出改革要「破立並舉、先立後破」，反映了中央對增量和存量關係的思路，既要優化各類增量資源配置，又要調整存量結構，推動優化整體經濟結構、提升效率。《決定》還體現出中央對制度公正的關注，例如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深入破除市場准入壁壘，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決定》對香港未來的發展也有着極其重要的指引作用，明確指出要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香港正積極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要按照《決定》關於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各項要求，持續加強基礎研究投入，鼓勵香港高校和企業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和關鍵技術創新。香港還可發揮金融、諮詢、技術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優勢，持續強化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產業集群深度融合，支撐科技成果轉化，實現產業協同發展。

《決定》表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積極發展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數字金融，加強對重大戰略和重點領

域的優質金融服務；明確要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同時還要穩慎拓展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優化合格境外投資者制度。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2023年，香港市場的離岸人民幣存款餘額達9392億元；香港承擔的全球人民幣支付清算量折合約159萬億美元，佔全球人民幣支付清算量的73.3%。香港可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優勢，提供多元的金融產品，吸引優質資金，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香港還要積極爭取增加離岸人民幣供給，提高離岸人民幣流動性，形成豐富的離岸人民幣產品體系。

《決定》將人才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之一，提出要建立科技發展、國家戰略需求牽引的人才培養模式，完善人才有序流動機制，完善海外引進人才支持保障機制，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

自由貿易制度、公平開放的競爭環境、低稅率 and 簡單稅制、與國際接軌的教育體系，構成了香港吸引、培養全球頂尖人才的基礎。近年來，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動下，更多香港專業人才在大灣區其他城市取得職業資格認可，得到到內地執業。香港可以在稅務、職業資格、學歷互認等方面，繼續拓展深化與內地的規則機制「軟聯通」，共同提升對國際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二十屆三中全會釋放出中央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香港總商會將幫助會員企業領會全會精神，把握國家改革發展機遇，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總商會主席、安永大中華區主席辦公室資深顧問

知庫專欄

水志偉、周國心

國際奧委會於今年7月宣布首屆電競奧運會於2025年在沙特阿拉伯舉行，電子競技經過多年來的爭論終於成為奧運項目，是電競產業發展重要的里程碑。

事實上，特區政府自2018年起積極支持本地電競產業。特區政府於2018年宣布向數碼港撥款一億元發展電競及相關項目，包括建立「數碼港電競場」、實行「電競行業支援計劃」及「電競實習支援計劃」，透過建造場地及培育人才推動電競的發展，此舉無疑明確肯定電競業的發展潛力。然而，上述兩個計劃已完結，加上不少賽事受到早前疫情影響而被迫取消，香港電競發展受到一定的打擊。

儘管如此，香港電競代表隊去年於杭州亞運《夢三國2》項目勇奪銀牌，反映香港電競能力的級數，政府可考慮投放更多資源發展電競。

目前，香港缺少對於電競人才的全面及系統性的培訓。當有香港電競運動員退役，電競體育或出現青黃不接的危機。根據電競業界人士指出，電競選手的黃金年齡介乎18至21歲，這意味着發掘潛質運動員需在其約14至15歲時開始，至大約其16歲時需決定是否成為職業電競運動員，並在18歲之前進行嚴格訓練。然而，去年香港電競代表隊的5位運動員的年齡介乎24至34歲，而且他們均是利用業餘時間進行電競訓練，因此他們的訓練時間明顯比其他地區的選手少，也較難以全

心投入。若要持續港隊於世界級賽事的佳績，特區政府可借鑒韓國的政策，盡早為電競業注入新血。

重啟「電競行業支援計劃」

對於韓國政府而言，遊戲產業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一種，產業中的電競則是精英體育運動。韓國政府早於2000年批准成立韓國電競協會，推廣電競，並於2012年推出《電子競技促進法》為電競業的培養人才、國際交流及賽事推廣等提出了長遠的規劃。人才政策方面包括支持地方政府建立電子競技組織及設施，並由指定體育選拔機構挑選電競生力軍。2019年，全球第一所電競專門學校更於首爾成

立，招收12至18歲的學生，培育新一代的運動員。同年，首爾Meditech中學獲得教育局批准於2021年正式設立電競科(e-sports)。

雖然香港目前沒有專門培訓電競的中學，也沒有中學設立電競科，但政府可循序漸進，先支持中學設立更多電競興趣課程，讓學生探索電競運動。另外，政府可重新啟動「電競行業支援計劃」，支援業界建立更多電子競技培訓組織及設施，從中學階段開始選拔電競運動員人才，而退役運動員更可擔任教練一職，為具潛力的年輕學生進行特訓及審核。

要培育本地電競運動員，加強有關電子競技的正面宣傳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現時，香港社會普遍對電子遊戲存在負面

偏見，不少關心子女學業的家長認為電競和「打機」之間是等號，影響學習，對於讓孩子成為電競選手或許有保留。因此，政府可多宣傳電子競技為體育項目及其專業性，消除社會對電競的誤解。政府還可舉辦更多與電競相關的合家歡活動，鼓勵家長和青少年參與，讓更多家長對電競體育項目有深入了解，增加支持子女入行的機會。

若希望香港的電競選手繼續在比賽舞臺中發光發亮，香港必須抓住世界電競發展的機遇，政府、業界、學校及家長亦需要通力合作，從人才培養及宣傳推廣入手，促進電競業發展。

作者分別為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研究部聯席主管、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培育電競運動員 備戰電競奧運